

近三十年來歐美西方漢學界中國旅行 書寫研究現狀、問題與趨勢

The Current Status, Issues, and Trends of Chinese Travel Writings in Sinology Studi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陳昉昊 (Chen Fanghao) *

一、緒言

隨著 20 世紀末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引入，旅行文學研究逐漸興盛，日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全球旅行遂被認為是一種帝國的志業、環球的責任、資本的膨脹與殖民的擴張。自 20 世紀末開始，中國旅行書寫研究也隨著西方理論的引入而日趨興起。在後殖民、啟蒙、跨語際等知識理論的框架下，學者們往往關注晚清民國旅行者的越洋跨境經歷，著力突出他們所遭受的文化震驚、身分困惑、轉譯難題等問題，關於中國人的海外經歷方面的著述尤多；而在這些卷帙浩繁的海外旅行研究學術著作中，關於在「中國」、「中華帝國」、「中華文明」等相對寬鬆劃定的地理疆域內的長途跨境／越界旅行研究，在海外漢學界則並不多見。¹

海外漢學，特別是歐美西方漢學的中國旅行書寫研究從未在國別文學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佔據主導地位。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海外學者往往關注詩歌、小說、戲劇等主流文類，對於旅行文學較少以主題文體進行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由於根深蒂固秉持的文類等級 (hierarchy) 觀念的影響，遊記文本往往列位於小說、詩歌、戲劇等文類之下，不被納入正典或正統之流。另外，由於旅行文學本身的閒適、散漫、安逸、布爾喬亞等標籤性特徵與目的，在情節架構、敘事模式、寫作風格、語言技巧等等上往往較為散漫與隨意，文學性價值相對較弱，故而學界對旅行文學關注度不高也是原因之一。

本文通過歸納歐美西方漢學界近三十年來中國旅行書寫研究，² 發現其路徑有三。³ 第一，對中國大陸旅行

* 作者現為上海師範大學全球城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係中國大陸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英語世界書寫中國文學史的批評文藝史觀比較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亦為上海市地方高水平大學重點創新團隊文化轉型與現代中國成果之一。

1 關於在中國跨文化旅行的西方研究成果，郭少棠簡要歸納了基本著作所涉及的範圍，並大致分為中國古代文人旅行研究、外國知識分子旅行研究、宗教朝拜旅行研究三類。見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1-12、36-40。

2 因本文分析內容僅限於海外漢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國人在中國的旅行書寫的內容，關於外國人來華旅行經歷的海外研究情況，筆者將另撰他文再作討論。另外，海外漢學界關於宗教旅行寫作的研究汗牛充棟，值得專文轉述，限於篇幅緣由，本文也不予以詳述。

3 相較於歐美西方漢學界對於中國山水風景文學的研究，日本漢學界對於山水遊覽始終重視有加。如小尾郊一、小野四平、高津孝、戶崎哲彥等對於中古山水遊記的研究提供了別樣視角。

史以一種總體史研究方式進行把握。中國古代旅行文學的發展與代際傳承、歷史堆疊、世代變革有關，自有其脈絡可以追溯，而中國現代旅行文化也與國族建設、邊界劃定、國家想像、反殖運動、身體政治一脈相承。第二，從風景建構的角度探討文學與地理的關係。文學與地理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依存。文學不僅是對地理的表徵，也在形塑觀景之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媒介。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從文學再現、景觀製造、文人身分、文化政治等角度來探尋。第三，以單一景點、單個旅行家／探險者／冒險家的角度，以點概面、管中窺豹，以此來理解中國旅行書寫。不管是徐霞客文人與探險家形象的時代流變，還是作為旅遊景點的黃山及其他濱海旅遊地區的形塑人們生活習慣與方式的角色轉變，海外漢學家以不同視角來重繪從古至今中國旅行的別樣圖景。海外漢學在中國主流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見，與華語世界研究學界互相映照，互為補充，相互影響，交互借鑑。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下討論的研究之中，學者提及的旅行寫作的情形，既涵括肉身的越界跨境、翻山越嶺，實地探訪自然景觀與人文古跡；也包括居家臥遊、想像夢遊，神遊創作身不能至、心卻嚮往之地；或者從更廣義來說，還包括資訊、知識、資源、物件等等的流轉與傳播、流通與混雜、交往與變異。此外，本文所探討的「中國」的文化和地理概念非常寬泛。鑑於中國廣袤的地理邦畿以及不斷變動的朝代版圖，所謂的「中國」疆域內的旅行往往也有「異族」與「他者」的遇見與交融，歷朝各代中國旅行者的流動也包括空間的體悟、他者的凝視與自我的認知。

二、整體與概述：一種總體史的把握

海外漢學將中國旅行史作為一種整體史的研究並不算多，但眾多海外研究學者達成一種共識：中國旅行寫作的發展歷程，是吸納翻新故往文本材料、繼承前人創作遺產、不斷演變與深化的過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榮休教授石聽泉 (Richard E. Strassberg) 於 1994 年出版的《題寫的風景：中國歷朝旅行寫作》(*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一書是西方世界較早介紹與系統翻譯中國旅行寫作的學術著作，⁴ 略顯遺憾的是，他在導論部分對於中國旅行寫作的總結，時段只討論到宋代，而在翻譯文本部分加入了大量金、元、明、清朝旅行寫作，但對上述時期寫作特色未在導論部分討論，稍顯遺憾。緒論部分首先指出，西方旅行寫作注重建構自由的獨立存在，對個體極為推崇。而中國直到唐代中期開始，旅行寫作者才以第一人稱開始抒情散文遊記的寫作。到 11、12 世紀，抒情遊記蓬勃發展。通過對先秦至宋代旅行文本分析，石聽泉總結了以下幾點：第一，中國古代旅行作家專注於景觀的文本化 (textualizing landscape)：一方面將物質景觀與文人名聲相互聯繫，另一方面也是將邊遠／邊緣地區的他者納入中國秩序的進程。第二，中國古代旅行寫作一般在歷史寫作 (客觀、道德化的歷史編纂寫作) 與個人寫作 (主觀、美學性的抒情表意寫作) 兩種寫作手法的光譜間擺蕩：在記錄歷史方面，許多作家鉅細靡遺地講述歷史，銘記過去；在個人寫作方面，旅行作家又融情於景，情景交融，抒情言志。第三，自先秦以來，旅行寫作者具有鮮明的流放症候群 (exile syndrome) 特徵，他們的寫作往往表達服務朝廷的宏願未滿與壯志未酬。石聽泉的諸多觀點，諸如互文性、勝地與文人的關係、史詩與抒情等分析理念與框架，對後世學者的深入研究頗具啟發地開啟了諸多門徑，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後世諸多學者循著上述這些理論路徑來進行深化研究。此後，雖然未以具體主題或延續時段對中國古典旅行寫作文學進行進一步研究，石聽泉仍在 2003 年出版了《中國動物寓言集：《山海經》中的精怪》(*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 一書，從神話學的角度，兼備地誌和神遊的研究視角，向西方學界譯介中國神話地理文學經典，或許是他另闢學術理路的嘗試之作。

4 Richard E. Strassberg,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石聽泉的開山之作將眾多中國古代旅行文學通過譯介的方式帶給英語世界的讀者。然而他只是簡略地介紹了自先秦到宋代的旅行寫作。真正完備的中國古代旅行文學與文化史直到 2018 年才出版。以下探討的兩本旅行史通史著作恰好年代互為補充，也可見兩者研究路徑的顯著差別：文本審美與意識形態。如此兩種旅行史的寫作路徑恰好成為海外漢學中國旅行史的兩種經典範式。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伯尼分校教授何瞻 (James M. Hargett)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 (*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以下簡稱《玉山丹池》) 是海外漢學界第一部編年中國傳統遊記文學史的著作。⁵ 職是之故，此書通過文學形式研究 (體裁研究) 與歷時研究 (文學史) 相結合的方法，致力於將遊記文學 (尤其是遊記散文) 這一體例的興起、發展與繁榮做一概覽式的考量，研究年代從六朝至晚明結束，時間跨度長達 1400 餘年。對於非母語閱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從宏觀全景維度瞭解中國古代遊記文學的入門級的學術著作，所以在枚舉案例分析的時候，往往為了以點帶面而不得不點到為止。全書分為五章。第一章專述中國山水寫作的發端，指出六朝時期出現的賦、書、序、記以及佛教旅行文本，均開始留意於行動／移動／位移的概念，表達旅行寫作的呈現是一種動態過程。另外，諸如慧遠、石崇、法顯等旅行寫作者關注地理位置的標記與史實典故的使用，為後世提供儲備意象 (stock topoi) 的範式；同時，這些旅行作家開始使用「景觀描寫——作者評論」 (scenic description-author comment) 這一敘事模式，對於所觀之景作出回應，如《水經注》即是從紀實性向文學性語言的過渡。第二章關注唐代旅行寫作的再發展，關注不同旅行作家採用不同的創作技巧：以柳宗元為代表的文人山水散文的創作，玄奘用資訊性和描述性語言相結合的方式來記錄異域奇聞，李白創制的記事遊記散文，元結的深度發

展描述遊記，李翱旅行日記的出現，諸如此類，在文學體裁、語言風格、敘事組織方面獨樹一幟。第三章將宋代遊記納入到家庭出遊框架之中，指出旅行作家在體裁多樣性方面 (遊覽敘述、江河日記、使臣敘述) 所作出的努力。第四章闡述金、元、明旅行寫作的轉變，篇幅較之前述數章而更長，加入了更多個人化甚至離題性質的討論，提到旅行遊記也仰賴作者的視覺與聽覺細節的排布。第五章分析旅行寫作在晚明黃金時代的成就，從娛樂遊覽、學術評論、地理調查三種類型來探討晚明旅行寫作的日漸成熟，這三種類型均展示了旅行寫作對於自我呈現／再現 (self-representation) 的努力。旅行寫作在當時成為一種肆意表達自我的文本樣式。

另外，何瞻在本章特別提及，不應將徐霞客等旅行作家僅僅看做是探險地理作家，其作品的文學性一再被大眾忽視這一事實。全書的主要特色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將中國遊記文學當做是一個連續發展 (continuous development) 過程，在晚明之際達到頂峰。第二，將遊記文學當做是一個動態變化、兼收並蓄的開放體裁進行研究。不管是單純描述，還是個人評論，旅行寫作者都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旅行寫作。第三，研究文本互文性的問題。與詩歌明顯的典故援引、選詞模仿、句式結構不同，遊記散文對前代的文學借用並不明顯，然而許多文本因描寫同一地方或地域成為一種文本集合體。第四，中國遊記文學尤為關注視覺性，特別是在通過空間移動而構建的視覺性景觀以文字的形式來動態化呈現。⁶ 《玉山丹池》一書還留白諸多未有涉及的問題：其一，旅行寫作的出版與自我表述之間的關係。書中提及的作家有意識地為了日後公開出版而寫作的旅行日記，是怎樣進行自我形象的塑造的？在創作過程中有意識的組織過程，是否有跡可循？第二，旅行作家如何平衡作為寫景狀景的消閒放鬆旅行與作為觀時審世的社會考察旅行之間的矛盾？作為休閒的旅行與作為調查的旅行之間如何

5 James M. Hargett, *Jade Mountains and Cinnabar Pools: The History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中譯本見何瞻著，馮乃希譯，《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6 在《玉山丹池》一書總論部分，何瞻總結了其對中國遊記的四個觀察。見《玉山丹池》，頁 18-22。在此基礎上筆者結合正文章節內容進行進一步歸納與總結。

達到一種平衡？

美國波士頓學院副教授莫亞軍《行旅中國：一部旅行文化史，1912-1949》（*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以下簡稱《行旅中國》）是近來出版的唯一一本研究民國時期旅行文化的學術專著，⁷填補了何瞻所預留的部分時間空白（清代部分依然空缺）。《行旅中國》的核心觀點是「現代旅行塑造／造就現代中國（Modern Travel Made Modern China）」，⁸全書將晚清民國旅行的旅行實踐進行分類，除導論與結論外共分為五章。第一、二章為第一部分，分析中國旅行社以及友聲旅行團的商業旅行活動，探知私營機構與組織是如何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市場，營造「中國旅遊」這個概念來建構民族旅遊業的。第二章獨立作為一部分，研究印刷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著力分析導遊／導覽手冊、旅行雜誌及旅行專欄怎樣推廣「全國」這一概念並且將國家看做一個整體。第三、四、五章為第三部分，分析在西北、東南、東北及臺灣地區的科考探險、商業調查和戰時逃難等旅行活動，特別留意在面對殖民主義者對邊地的侵略與控制的時候，旅行者激發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熱情如何體現旅行與國族空間的構型之間的緊密關聯。《行旅中國》使用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這一理論框架，將旅遊作為產業與志業進行民族化架構的分析。

莫亞軍此書至少提出了富有創新意義的三大洞見：第一，破除歷來將民國旅行作為休閒娛樂活動的苛責，確認民國時期的商業旅行在塑造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管是民族資本家建立的中國旅行社，還是民間組織的業餘旅行活動團，都在推廣國家地理概念上作出了許多貢獻；國內旅行是作為一種定義中國疆域、劃定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族觀念活動。第二，以「想像共同體」為框架的中國現代印刷資本主義，對於建構中國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民國時期不斷

湧現的旅行類期刊、畫報、報紙等一系列印刷出版物，不光擴大了大眾視野，同時也形塑民眾意識。第三，民國時代邊地的異域化、他者化的認識與所謂的建構現代中國、納入中國版圖的互動意義，亦即是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邊地的特殊性如何被納入到普遍性的框架之中？

《行旅中國》關於民國旅行史與旅行文化的研究跨越了商業政治、日常生活、印刷出版、地理想象、科學考察、離散族群等多個研究領域，將與旅行相關的虛擬與實體活動均列入研究範圍之中，為我們認識民國時期的旅行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不過，《行旅中國》還留待我們思考一些問題：將旅行活動納入「民族——國家」框架之下，是否抹去了其他許多日常旅行或者位移活動的特徵與特質？除了「建構中國」這一類型的旅行活動，我們是否還可以探討其他諸如宗教朝拜、家庭旅行、自主遷徙等旅行活動的多樣性？現代中國旅行形式的多樣性是否有待我們進一步挖掘？第三，當我們在研究現代中國旅行圖景的時候，性別、階層、年齡因素是否同樣可以作為考慮的維度？顯然本書涉及討論的旅行寫作者大多為男性，女性與兒童如何在現代中國旅行？他們的聲音如何被聽到、認識並且理解？這些問題都有待學者作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

三、景觀與風物：文學、地理與旅行寫作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以下簡稱《神遊》）研究中古時期與19世紀（海外旅行）兩個時段的中國旅行文學寫作模式。⁹因本書著重關注中國國內旅行文學，故僅討論《神遊》前三章內容，而後

7 Yanjun Mo, *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8 Yanjun Mo, *Touring China: A History of Travel Culture, 1912-1949*, p. 207.

9 Xiaofei Tian, *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中譯本見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半部關於中國 19 世紀海外旅行文學的討論在此不予討論。通過研究詩、賦、道教寫作、佛經及注論、出征記、行旅賦、佛教遊記等不同類型的文本材料，田曉菲提出研究中古旅行文的兩個重要概念。第一，中古時代魏晉時期的旅行者具有「心靈之眼」(mind's eye)。所謂心靈之眼，是一種觀看模式、創作章法、想像範式。東晉文人以「心靈之眼」模式對自然景觀的觀覽其實是重審內心的一種延伸。換句話說，是觀者對自然景觀的理性關照才感知到了外部世界之美，生成一系列的洞見 (insight)；有時肉身無需到訪也可以通過「心眼」想像製造外部世界。個人化場景的鋪陳展現成為東晉詩歌的主要特色之一。這種通過旅行寫作呈現的觀看視角、法則、態度、反應等等，精心再現了山水風景，也通過「景」、「心」交融達到至臻至善地步。第二，在時代變革的語境下，中古時代的旅行者經歷了「錯位」(dislocation)，「既是實際發生的，也是象徵性的；是身體的，也是精神的。」¹⁰ 在身體與心靈或其一越界、或兩者皆「跨境」的前提下，這種「錯位」不僅為他們提供了視覺與身體上的差異體驗，也提供了思考方式的全新置換。旅行作家不斷在比較性思考中理解個人與世界。

基於以上兩個理論框架，田曉菲還總結了中古時代旅行寫作關於觀看、觀照、想像的模式。第一，中古時期的旅行寫作以「歷史模式」呈現，在時間概念的映照下關注今昔之對比，或感傷故去，或借古諷今。不管是王羲之，還是陶淵明、謝靈運、戴延之或者其他行旅文學作者，都在嘗試用一種打亂時序的方法來處理古今之關係。而作為「歷史模式」典型的兩類作品中——由過去定義現在的「征行賦」、個人主觀時間凌駕於政治性時間之上的「征行記」——「賦的作者永遠在主動地觀看、究察和思考，比如謝靈運；但是記的作者可以是觀看、究察和思考的物件，比如戴延之。」¹¹ 征行賦關注遺跡與史實，將地理的重要性替換為歷史的重要性，強調附著在物質性古跡上的意義與價值；征行記往往把個

人前置於歷史舞臺與圖景之前，強調作者的主觀性與主角性，有時也出現對偏規越矩路線的探險與意外經驗，彰顯個人性色彩。這種個性化寫作的方式成為表志言情、訴心懷意的別樣創作方式。第二，中古時期的旅行寫作，特別是異域寫作，往往以「天堂／地獄」模式來展開。這種兩分法的寫作方式，不光是對異域的想像，同時也間接說明旅人克服困難的堅強意志。旅行對他們來說不光是一種測試與考驗，也是一種證明與確立。從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來看，法顯的旅行反轉了中國與異域之間的中心與邊地的關係。中國成為邊地，異域成為「中心」。在中心與邊緣不斷遊移過程中，中古時代旅行寫作者實現了對異域的描摹／想像與自身的認知／確認。當然，也有詩人表現出一種例外的狀態，比如謝靈運就對居於「中間狀態」情有獨鍾，用身處這一狀態來表現其獨特的個人特質。田曉菲關於中古時代旅行寫作模式的探討為我們提供了個人與風景、抒情與表意、主體與客體、歷史與日常等等眾多問題的探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田曉菲的分析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第一，此書所討論的大多為山水詩。除了山水詩歌之外，人文景觀或者其他情境類（節慶、閨怨、情事、軍事）等書寫該如何看待？這些詩歌作品是否提供了關於個人與國家、歷史與政治、個人與社群等不一樣的解讀角度？第二，除了「歷史模式」與「天堂／地獄」模式，中古詩人是否還有其他的創作模式？僅僅歸結為兩種模式，是否有過度概括 (over-generalization) 的危險？第三，上述兩種模式是否可以理解其他朝代的旅行寫作？或者，換句話說，其他朝代的寫作是否包括或者超越這兩種旅行寫作模式？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以下簡稱《題寫名勝》）儘管以中文寫作，研究思路卻仍是漢學式的：從名勝與唐詩的互為仰賴的關係入手，¹² 從詩人與名勝的「所有權」關係入手，從先行者與後繼者的關係入手，基於互文性與影響焦慮兩

10 田曉菲，《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頁 5。

11 同上註，頁 80。

12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儘管此書並未見英文專著出版，但由於商偉

大理論討論名勝、文本、詩人之間的錯綜關係。第一，從名勝本身來說，一方面它們可以作為實體物質基礎為詩人提供創作材料與靈感來源，通過碑刻、拓片等以實體留存的方式為詩人提供聲譽憑證；另一方面，名勝也可以仰仗詩文的流傳獲得不朽之地位。不管名勝如何初建、鼎盛、荒廢、傾圮、翻新、重修，只要詩文不散佚，文章即亙古流轉，名勝不管實體存在與否，亦不會湮沒無聞。同時前後代詩人對同一名勝的闡發，可以從不同角度為名勝提供新的註解。第二，就以同一名勝為主題的詩歌文本來說，這些詩歌通過歷時性與跨空間性的對話，不光構成了組詩對照性質的互文性文本，同時也通過經由代際詩歌輯錄的編纂者之手進入詩歌史，不斷正典化、系統化之後，在中國詩歌史和文學史中留有一席之地，進入經典文學殿堂，入籍在冊成為享譽中華帝國的文化資本。正如商偉所說，「所謂名勝風景並非詩人登臨觀覽、描狀物色的直接產物，而更多的是他與先前的文本不斷對話協商的結果。」¹³ 第三，就不同代詩人而言，後代詩人對前代詩人的創作從主題、選詞、句式、音韻的努力復刻與昇華，有時也帶動了前代詩人的聲譽傳播，同時這種競爭性的關係也促成了文壇的文本活躍化。不管名勝古跡存在與否，不管對話物件存在與否，後代詩人通過「想像／缺席寫作」，臥遊式想像訪古拜跡的旅程，與前代詩人與文學遺產與傳統的「跨時空對話」，成為當時詩歌創作的另類風潮。

前後代詩人的模仿與借鑑、改進與超越、推進與昇華，不光是一種獲取進入正典文壇入場券的「文學競賽」過程，也是一種對將自我名聲實體化、主張甚至與其他詩人其自身對於名勝的「所有權」——作品流芳百世，將個人名聲與名勝掛鉤，實現其本人的肉身超越與聲名永固。眾多唐代旅行寫作不光為我們打開了認識名勝的視窗，也在文學創作與文學經典化領域提供了理解唐代詩歌的全新角度。仍然值得追問的是，《題寫名勝》尚未提及在唐詩經典化、詩人神聖化的過程中，詩選編

纂者／編撰者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官方與地方學術機構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文學作品與政教機制之間存在怎樣的千絲萬縷的關係？另外，《題寫名勝》僅僅從作者本人在當時的創作情境討論，如何以超越作者別人的他者角度，以「後見之明」式的將來現在時角度來認識作者形象與作品在唐代以後的不斷變遷甚至變異，也是仍待釐清的問題。

四、觀光與探險：旅行者的經驗

英國愛丁堡大學中國研究高級講師汪居廉（Julian Ward）於2013年出版的《徐霞客（1586-1641）：旅行寫作的藝術》（*Xu Xiake [1586-1641]: The Art of Travel Writing*）（以下簡稱《徐霞客》）是英語學界第一部以徐霞客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¹⁴ 正如汪居廉在緒論部分結尾指出，該書旨在揭示徐霞客作品中的主觀因素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ive）。與以往認為的徐霞客以地理學家身分勘探地貌、描繪地質、探查地形的科考身分書寫不同，汪居廉試圖從感性而非理性的角度來還原一個鮮活的旅行者和旅行作家形象。

此書從中國遊記史開始談起，繼而關注徐霞客旅行寫作的普遍特色，最後著力分析其關於中國西南地區的遊記風格和寫作特色。其主要觀點有三：第一，從信馬由韉的奇思妙想，到想像神遊式的寫作，再到親眼所見的實地探訪，中國旅行文學自先秦至晚明發展日臻成熟。第二，作為探險家的徐霞客是後世的經典化創制；而他的古典文學素養、對文學敏銳度以及融合儒道、風水理論等寫作，兼具文學與宗教的知識素養，這些特質往往被大眾忽視。第三，徐霞客的西南遊記依然遵循了既有的中心／邊緣模式，對邊地少數民族抱有中原文化與文明的優越感，然而在實質上他也幫助雲南土司在文化政策上獲得一種政治權威與政權穩定。本書第一章關注中國早期遊記史，從其志怪神話起源談到自唐代起作為一種獨立文體。時至明代，

常年在海外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並且此書的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學術脈絡的影響，故也將此書納入到歐美漢學研究範疇。

13 同上註，頁171。

14 Julian Ward, *Xu Xiake (1586-1641): The Art of Travel Wri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遊記成為一種追尋個性啟蒙 (personal enlightenment) 與精確地理資訊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的表達方式。或者說，這是一種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表達方式。

汪居廉指出，唐以前的地理寫作只提供客觀資訊而將個體情感隱藏。自唐代柳宗元開始遊記寫作風潮逐漸轉變，將史實與觀感結合。宋代之時，由詩人與外交使者撰寫的遊記文學的知識化／智識化與經典化發展升至巔峰，但並無精確探險意識。時至明朝，文人與地理學家不斷豐富遊記文類寫作，藝術家與理學家不斷開拓新的領域。另外，作為地方旅遊與貿易的記錄的地方誌以及路程圖記，在明代見證著作為一種產業的旅遊業的興盛，使得明代的旅行寫作成為事實與意見的結合體。徐霞客擁有勇敢、獨立、愛冒險的性格，他心存對自然敬畏，與現代科學探險科考方式大相徑庭。在主體部分，針對部分學者對於徐霞客遊記主旨混亂、敘事糟糕的寫作創作技巧方面的詬病，汪居廉指出徐霞客西南遊記的美學價值根植於古代關於自然的寫作的美學傳統，最後一章重點分析徐霞客多於中國山川峽洞的拜訪。在汪看來，徐霞客既取法文學傳統，又彰顯符合其年齡的個性特徵，其寫作在理性觀測與感性抒發之間達到平衡，其文體風格、敘事模式也成為值得考量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值一提的是 1970 年代新發現的徐霞客遊記對已有材料進行了填補與擴充，挑戰了此前對徐霞客寫作過分功利與客觀的苛責，豐富了徐霞客的旅程細節，這些材料也被該書運用，用以證明徐霞客對自然的美學敏銳度，對古典傳統知識的援引與借鑑，發掘出其陽剛、果敢形象的另一面，「反映出徐霞客傳達的是一種人類與自然達成和諧狀態的意識。」¹⁵ 汪居廉論述徐霞客的寫作語言特色，指出活動 (movement) 與視野 (vision) 的結合，雙腳與雙眼，觀察／觀測／審視／搜尋 (investigation)，助動詞、形容詞與對仗句式的使用，彰顯徐霞客在主觀情感與客觀記錄上的努力。

基於以上幾點的考量，對於汪居廉的研究留有諸多重新思考的餘地：第一，從版本學、文本經典化、作家形象塑造等方面考慮，在不同版本中，編輯對於徐霞客遊記有心或無意進行形象剪裁要如何定奪？所謂不同版本的徐霞客遊記所建構的自然景觀，是徐霞客本人的自創，還是只是不同編輯的想像式建構？第二，徐霞客孤勇冒險的探險家形象是後世不斷累積建構的結果，不同時代，基於何種原因，要建立如此的徐霞客形象？第三，基於何種原因造就了徐霞客的「自我東方主義」式的態度？他對西南地區的旅行寫作是為了重新確立自我優越感身分還是對於邊地自然的獵奇？

瑞士蘇黎世大學東方學院現當代中國首席教授洪安瑞 (Andrea Riemenschneider) 旁涉旅行文化研究，其於 2015 年發表的中文論文〈旅行家的召喚：徐霞客及其西南邊陲之旅〉指出，¹⁶ 徐霞客遊記所表達的不僅僅是探險式的英雄主義精神，還在於一種堅持內在自我發展的儀式感。第一，以徐霞客為代表的旅行家不再如前人一般表達對逃避官場的無憂無慮 (不管是否出於真心)，而熱衷於求索新知，啟迪心智。第二，徐霞客對於將所觀之景納入到自定的宇宙觀照的想法，雖與後世建構的理性科學探險形象相悖，但是也表明他的個人形象的多面性。第三，徐霞客的這種「旅行癖」以及對「奇」的追求並且勤於寫作的過程，這是一種將中國旅行寫作儀式化的過程。與汪居廉類似，洪安瑞也試圖超越故往對於徐霞客英勇探險家刻板印象的討論，指出在自我培養 (self-cultivation) 這一方面，徐霞客作出的不斷努力。

關於現代中國旅遊業的發展，諸多研究者也提供了許多從景點到旅行者個人的案例分析。比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董玥 (Madeleine Yue Dong) 在〈上海的《旅行雜誌》〉一文中指出，¹⁷ 上海旅行者的世界主義身分是基於與中國其他地區的人的比較中建構和確認的；正是處於此種比較，上海人的身分得以建立，上海具有

15 Julian Ward, *Xu Xike (1586-1641): The Art of Travel Writing*, p. 82.

16 [德] 洪安瑞, 〈旅行家的召喚：徐霞客及其西南邊陲之旅〉, 《河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5.1: 1-10。

17 Madeleine Yue Dong, "Shanghai's *China Traveler*," in Madeleine Yue Dong and Joshua L. Goldstein, eds.,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pp. 195-206.

半殖民性質的世界主義文化精神是通過上海人離滬出行並且與外地人交流中逐漸形成。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助理教授 António Barrento 在〈變／去現代：晚清與民國時期在海濱與山莊度假勝地的旅行經驗〉(Going Modern: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t the Seaside and Hill Resorts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一文中通過研究濱海和山區旅遊目的地的變化過程，¹⁸ 指出民國最負盛名的旅遊圖文雜誌《旅行雜誌》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的身心觀念——對尋求理想庇護地的需求，對理想旅行經驗的追尋，以及將旅行作為身心塑造重要一環的諸多理念。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副教授高敏 (Miriam Gross) 在論文〈轎子上的胡思亂想：民國市場化旅遊業，1927-1937〉(Flights of Fancy from a Sedan Chair: Marketing To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37) 中指出，¹⁹ 民國時期建立的中國第一家商業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將西方旅遊業概念本土化，為大眾推廣了兩大理想旅行之地——安徽黃山與中國南部的南洋，這一商業化過程建構了旅行目的地，同時也為建構地方與民族身分提供了契機。

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教授鄧津華 (Emma Jinhua Teng) 在《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一書中承繼新清史研究理論脈絡，²⁰ 從清人對於臺灣的遊記書寫出發，描繪出清代知識分子對於臺灣從蠻荒彈丸之地到大清王朝疆域一部分的意識轉變，同時也反映了清朝上層

對邊疆的經略和統治策略。類似主題專著亦見歐陽泰 (Tonio Andrade) 的《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²¹ 其關注點在歷史學上，間涉部分遊記文本材料。

除了以上幾部著作，旅行寫作和佛教研究者彼得·畢尚普 (Peter Bishop) 《香格里拉神話：西藏、遊記和西方對聖地的創造》(*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雖不屬於漢學研究範疇，²² 但是針對外國人在華旅行經歷的研究可謂是開山之作，也非常值得一提。西方旅行者對西藏的建構正符合了他們對全球的想像。正如沈衛榮所評論，「Bishop 先生的這部著作對讀者瞭解西方人構建的有關雪域的神話，以及這個神話在形成西方對於東方之理解或者成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²³

五、現狀與趨勢：中國旅行書寫的未來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之外，在文學地理學研究領域也出現探討旅行寫作的著作。美國維斯大學東亞學院副教授王敖《中唐時期的空間想像：地理學、製圖學與文學》(以下簡稱《中唐時期的空間想像》) 研究「空間如何透過中唐文人們的思想濾鏡，變形成為映射在文學接受面上的影響。」²⁴ 換句話說，中唐文人通過文本「視覺想像」，創造性地建構起唐帝國的疆域版圖，成功實

18 António Barrento, "Going Modern: The Tourist Experience at the Seaside and Hill Resort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52.4 (2017): 1089-1133.

19 Miriam Gross, "Flights of Fancy from a Sedan Chair: Marketing Tour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37,"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6.2 (2001): 119-147.

20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中譯本見鄧津華著，楊雅婷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8)。

21 Tonio Adam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譯本見歐陽泰著，鄭維中譯，《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

22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3 沈衛榮，《想像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3。

24 Ao Wang, *Spatial Imaginaries in Mid-Tang China: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Literature* (Amherst, MA: Cambria Press, 2018)。中譯本見王

現了文學與地理學的雙向互動。中唐南方旅行寫作不光描述視覺觀感上的景象，同時也對地方的聲音聽覺、氣溫感知等進行了文字呈現。這種調動感官的方式也成為了中唐旅行寫作的獨特範式。這種寫作模式為我們打開了中唐文人認識世界的視窗。

另外，女性研究領域也有諸多探討女性旅行寫作的篇章或者論文。由於傳統中國的性別規範與家族角色決定，女性大多沒有機會離開閨房或居所。而諸如女性旅行寫作由於知識水準的限制則更少之又少。海外女性研究領域的漢學家在研究女性的家族旅行、結社旅行、個體旅行等等行為活動之後，指出女性在挑戰固有的性別角色、表達自我聲音、建構個人與群體形象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方秀潔（Grace S. Fong）在《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分、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的第三章〈著寫行旅：舟車途陌中的女子〉

（*Authoring Journey: Women on the Road*）中指出，²⁵ 女性旅行寫作通過日常記錄，表達女性聲音，建構女性角色，承擔女性責任，充分表現了她們的主觀性、主體性與能動性。另外，收錄於《移動中的性別：明清與現代中國的勞動分工與文化變革》（*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一書中的，由美國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榮休教授曼素恩（Susan Mann）撰寫的〈明清婦女的載德之旅〉

（*The Virtue of Travel for Women in the Late Empire*）一文指出，²⁶ 明清文人已經逐漸意識到女性禁錮對於對世界的認知和寫作百害無一利。自明代商業革命起，精英女性離家出行風潮漸盛。不管是結社出遊，或是宗教朝拜，或是隨夫遷官，或是歸寧訪親，女性聲音凸顯。而

以清代閩秀張紉英為例，曼素恩提出，女性旅行寫作在證明女性美德與型塑女性身分過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

縱觀海外漢學中中國旅行研究的幾大方向，我們可以管窺近來研究的幾大趨勢：

第一，在文本互文性方面，諸多研究者都提到了歷史引用、文獻裁剪、跨代競爭、經典傳承等涉及文學再現、文本經典化、文人身分、文化政治等面向，比如石聽泉、何瞻、田曉菲、商偉、鄧津華等學者的論述，均從不同角度涉及文學經典的傳承、文學套語的化用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政治與文學創作與傳播環境的變化與衍生。在這些歐美漢學學者的討論中，我們不光理解中國古代文化環境的變化，文人身分的演變，也理解在不斷歷史演進過程中，文學與景觀、文人之間、作者與讀者這些複雜和多變的關係。

第二，物質景觀與旅行文本之間的互存關係。作家在追求文名之不朽（literary mortality）付出不懈努力，諸多史跡成為文學文化的「聖壇」，而眾多寫作也仰賴名勝成為經典。在作品背後，我們看到文化機制的運行、文化場域的建構、文化世界的塑形。作為物質的名勝古跡與作為非物質的文學文本互相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深入研究。另外，旅行勝地的塑造一種漸進性的「歷史疊加」（historical layering）過程。通過不同時代的旅行文本，我們可以理解不同景點的建構性過程。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過程的複雜性以及背後的運行機制，而不能簡單地把關於景點的旅行寫作認為是景點的經典化、名勝化過程。

第三，眾多研究者反對將旅行寫作作家標籤化、刻板化與臉譜化的處理方式，強調旅行作家通過旅行寫作在找尋客觀性與主觀性、歷史與個人、自我與公共等要

敖著，王治田譯，《中唐時期的空間想像：地理學、製圖學與文學》（南京：長江文藝出版社，2021），頁3。

25 Grace S. Fong, *Herself an Autho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85-120。中譯本見方秀潔著，周睿、陳昉昊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別身分、能動主體與文學書寫》（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頁105-149。

26 Susan Mann, "The Virtue of Travel for Women in the Late Empire," in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eds.,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55-74。中譯本見曼素恩著，〈明清婦女的載德之旅〉，收入盧葦菁、李國彤、王燕、吳玉廉編，《蘭閨史蹤：曼素恩明清與近代性別家庭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225-242。

素之間的平衡。何瞻提綱挈領式的中國古代旅行文學簡論中即強調旅行作家創作的多樣性，挑戰固有的對於探險地理作家徐霞客的刻板印象。²⁷ 此後，汪居廉與洪安瑞也追尋此路徑，告誡大眾需要重估徐霞客的旅行寫作遺產，打破固有認知框架，重識徐霞客的旅行家形象，提出其創作的多面性和多元性。而進入現代，旅行寫作者對於上述提及的要素之間的平衡更為關注，旅行產業從業者、旅行雜誌出版商與編輯、旅行寫作者逐漸開始關注現代／世界主義者身分的塑造、國家想像、地理建構等與民族、國家建設息息相關的內容。

此外，歐美漢學界關於中國旅行書寫的研究固然受到後殖民、啟蒙、跨語際、風景理論等等源於西方知識理論架構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受到華語地區學術研究的反芻。譬如在田曉菲的《神遊》中，對於以下事實隻字未提：《神遊》的初稿是以中文版《失樂園和復樂園——法顯的天竺之行與最早中古時代天堂／地獄的文化敘事結構》在中研院和哈佛大學合辦會議上發表的會議論文，最後也刊登在中研院文哲所出版《遊關——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2013）。商偉的《題寫名勝》是在學術講座的基礎上整理寫作而成，原本就是面對華語讀者。另外，也許由於出版時間較早和華語地區學術文獻當年在歐美地區較難獲得，何瞻的著作儘管吸收了不少華語學術成果，但也未見詳細徵引。²⁸ 對於

華語地區學術成果的普遍、有意或無意的忽視，似乎又加固了西方學術霸權的堡壘。

綜上所述，海外漢學對於中國旅行書寫研究日趨多樣全面，然而依然還有許多問題留待我們進一步探索。首先，目前海外漢學中國旅行書寫與文化研究諸多研究觸及了主體性與客觀性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問題。旅行文學無論討論何種問題，在突出或者平衡主體性與客觀性方面，不同作家的處理方法顯然不同。然而當我們對旅行寫作進行簡單的二分法操作的時候，是否落入了本質主義的陷阱？其次，在國族主義、民族——國家框架下的中國國內旅行研究是否已經成為旅行研究的陳詞濫調？中國國內旅行研究除了自我情感的投射或者民族主義的激發，是否還有其他研究路徑可循？擺蕩在個人情感紓解、景象照射與國家——民族建構之間的旅行寫作是否還有其他解讀的可能？另外，除了作為名勝的黃鶴樓、黃山和作為旅行家的徐霞客，如何勾勒普通風景與地景的發現與建構？如何從地方性的角度來認識風景在地方身分認同中的作用？如何找尋日常旅行生活與普通人旅行記錄？如何認識不同旅行類型寫作，包括職務調動、求學問道、宗教朝覲、戰亂遷徙、災荒逃難、外交禮訪等，在個體與國家，表情達意與克己專理之間達到（或者放棄）某種平衡？這些問題都有待學界進一步推動與深入。

27 見何瞻，《玉山丹池》，頁 209-226。

28 這裡，筆者要感謝一位匿名評審專家為我指正這一點。